

大卫·哈维时空修复理论视域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

张逸飞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2日

摘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进程与21世纪以来的再工业化战略, 构成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地理变迁的一幅完整图景。在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总体脉络中审视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 可以发现去工业化是资本应对过度积累危机的一次大规模空间修复, 通过制造业的地理转移、金融化的时间延迟以及全球生产空间的重组, 暂时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资本过剩与利润率下降的压力。然而, 空间修复具有内在的暂时性与矛盾性: 它既在特定时期内解决了旧有空间中的积累困境, 又在新的空间中再生产出危机条件, 并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就业流失与区域衰退等结构性后果。21世纪以来的再工业化战略, 本质上是在旧有空间修复效力耗尽之后启动的新一轮时空“再修复”, 资本试图通过关税壁垒、产业补贴与基础设施投资等手段, 将制造业“拉回”本土。然而, 这一“再修复”面临着利润率规律的刚性约束、海外固定资本的锁定效应、金融资本的结构性抵制以及国家财政的空间收缩等多重障碍, 其成效难以超越时空修复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交替并非产业政策的简单摇摆, 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空间维度上的周期性表达。每一次空间修复都只是危机的转移与延迟, 而非根本性的消除。

关键词

大卫·哈维, 时空修复, 去工业化, 再工业化, 资本主义危机, 制造业

Contemporary Capitalism's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industr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vid Harvey's Theory of Spatio-Temporal Fix

Yifei Zha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since the 1970s and the strategy of reindustrialization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ave formed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industrial geographic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overall context of Marx's crisis theory of capitalism, examining David Harvey's theory of "spatio-temporal fix", it can be found that deindustrialization is a large-scale spatial repair of capital to cope with the crisis of excessive accumulation.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transfer of manufacturing, the delay of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production space, it temporarily alleviates the pressure of domestic capital surplus and declining profit margins i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However, spatial restoration has inherent temporality and contradictions: it not only solves the accumulation dilemma in the old space during a specific period, but also regenerates crisis conditions in the new space, causing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such as hollowing out of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mployment loss, and regional decline i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s essentially a new round of spatiotemporal "re repair" launched aft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ld space repair has been exhausted. Capital attempts to "br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ck to the local market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tariff barriers, industrial subsidies,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However, this "re repair" faces multiple obstacles such as rigid constraints of profit margin laws, lock-in effects of overseas fixed capital, structural resistance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spatial contraction of national finance. Its effectiveness is difficult to surpass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spatio-temporal fix itself. The alternation between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industrialization is not a simple swing of industrial policies, but a cyclical expression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Every spatial restoration is only a transfer and delay of crisis, rather than a fundamental elimination.

Keywords

David Harvey, Spatio-Temporal Fix, Deindustrialization, Reindustrialization, Capitalist Crisis, Manufactur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工业化曾被视为现代国家繁荣的核心动力与必由之路。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产出与就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大量工厂关闭或迁往海外。进入 21 世纪，为克服制造业困境以及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启了一场再工业化的进程。从理论层面阐释这一看似悖论的产业地理演变，已构成当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课题。针对该问题，大卫·哈维提出的“时空修复”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哈维在《资本的限度》中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时间修复”(将过剩资本投入长期项目以延迟回流)和“空间修复”(将资本与劳动力盈余转移到新的地理空间)来暂时缓解过度积累危机。哈维本人曾明确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去工业化视为空间修复的典型案列。然而，既有研究对哈维理论在再

工业化议题上的应用尚不充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空间修复的产物，而再工业化则是这一修复逻辑耗尽之后启动的新一轮“再修复”。两者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的内在悖论，即每一次修复都只是危机的转移与再生产，而非根本性的解决。

2. 资本主义“时空修复”的悖论

剩余价值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阐明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本质：在资本优先、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终极目标的逻辑下，生产方式内部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必然爆发，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的崩塌。尽管马克思深刻论证了危机的必然性，但他未充分解答一个更复杂的谜题：为何资本主义历经多次危机却未彻底崩溃？哈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盲点，指出马克思的分析聚焦于危机在“时间维度”上的周期性发作，而相对忽视了资本主义如何在“空间维度”上吸纳和转嫁危机[1]。这一理论留白，恰好为哈维的创新性介入提供了契机。

哈维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在《资本的限度》中明确界定，过度积累危机是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周期性病症，其特征是“资本盈余与劳动力盈余并存，却无法通过盈利方式有效结合”。这种内生且不可避免的危机倾向，正是驱动时空修复策略的根本动力。

既然危机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该体系何以在屡次冲击下存续至今？哈维认为，资本虽无法根除危机，但能借助“时空修复”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转移并延缓危机[2]。

所谓时间修复，指资本从短期生产投资转向长期基础设施、科研教育或金融投机等领域。例如，建设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或大型地产项目，能在短期内吸收大量过剩资本，并将回报周期延长至数十年。然而，时间修复实质是“以时间换空间”，它并未消除过剩资本，仅将其固化于长期资产中。一旦这些资产无法产生预期收益，危机将以更猛烈的方式反扑。

空间修复，则是将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导向尚未充分资本化的地理“外部”区域。通过开辟新市场、开发新资源及构建新生产体系，资本得以暂时逃离原有空间的饱和竞争，在新地域重启盈利积累。哈维特别强调，空间修复遵循“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逻辑，交通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加速了资本跨越地理障碍的速度，将全球非资本领域纳入资本版图。

然而，哈维对“修复”一词的使用蕴含深刻悖论：它既意指“解决问题”，又意味着“将资本固着于空间”。当巨额资本沉淀于特定地域的工厂、港口及道路等建成环境中，资本的流动性便受到制约，这些“固定资本”反而成为后续向新空间转移的结构性阻碍。正如学者所言，空间修复“提供暂时缓解，却让根本问题溃烂蔓延”。固着于某地的巨额资本，往往成为“在其他地方实施空间修复的阻力”。

由此得出核心论断：时空修复绝非资本主义危机的终点，而只是危机在时空层面的重新配置。每次修复在化解旧矛盾的同时，也再生产出新的危机条件。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创造性地破坏”旧空间景观、塑造新空间景观，来一次次规避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危机”，但这仅仅是拖延，而非根除。

3. 去工业化：过度积累危机下的第一次空间修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并非自然的经济演进，而是资本主义危机驱动的结构性的重构。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暴露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内在矛盾(国内市场饱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迫使资本选择哈维所称的“空间修复”路径，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低成本地区转移。这一转移得以实现，得益于运输通信技术革命与国家政策的主动配合(金融放松管制、取消产业补贴、税收优惠鼓励海外投资)。空间修复虽暂时通过压低成本和开拓新市场缓解了危机，却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就业与GDP占比持续锐减、工业城镇衰败)[3]。随后，从制造业溢出的资本转向金融领域的“时间修复”，利用衍生品和次级贷款透支未来信用。

3.1. 滞胀危机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崩溃

去工业化并非所谓“自然的后工业化转型”，实则是资本主义危机驱动的结构变革。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泥潭，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经济停滞不前。这恰是马克思所述过度积累危机与利润率下降的典型症候，战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内在矛盾由此集中爆发。一方面，历经战后二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市场趋于饱和，主要耐用品家庭普及率均超过 80%，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实现危机压力剧增。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工会势力强劲，加之福利国家体制带来的税收重负，致使本土资本利润率持续下滑。正如哈维所言，当国内利润率无法回升时，资本面临两条路径：要么通过大规模资本贬值强制出清过剩产能，要么实施空间修复，向海外转移。资本最终选择了后者。

3.2. 资本的空间逃亡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跨国公司系统性地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与组装环节大规模转移至东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等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在哈维看来，这是一次典型且规模空前的空间修复：从饱和工业投资中溢出的过剩资本，流向尚未充分工业化的“外部空间”，在那里重建有利可图的积累结构。

这一空间修复的实现得益于运输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当生产技术创新趋于停滞时，航运与通信技术的进步，结合工厂劳动的“去技能化”与抽象化，为生产的空间重组开辟了路径。工厂生产不再受制于区域市场的分销限制，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布局[4]。

从哈维的视角看，去工业化的空间修复至少在两方面暂时缓解了危机：海外低廉的劳动力显著降低了总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利润率的侵蚀；同时，海外新兴市场为资本核心国家提供了新的需求空间，部分消化了国内的过剩产能。

3.3. 空间修复的危机再生产

正如哈维所警示，空间修复仅实现了危机的转移，而非根本解决。去工业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土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冲击。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总数的比例，从 1970 年的约 25% 降至 1993 年的 15%；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也从 1979 年约 1942 万人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由 2000 年的 1727 万人锐减至 2010 年的 1151 万人，流失超过 570 万个岗位。同时，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从 1970 年的约 24% 跌落至 2023 年的不足 11%。众多工业城镇衰败为“铁锈地带”，导致社区凋敝、中产阶级萎缩及社会分裂加剧[5]。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随着大量资本从实体产业撤出并涌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领域，哈维所言的“时间修复”逐渐主导了经济的运行逻辑。金融资本借助复杂的衍生品、次级贷款及资产证券化手段，吸纳了从制造业溢出的过剩货币资本。然而，这种时间修复本质上是“以未来透支现在”，它虽能通过制造虚拟账面财富来延缓危机，却无法扭转实体经济利润率长期低迷的根本局面。

4. 再工业化：危机之后的新一轮时空“再修复”

再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造成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就业流失与区域衰退之后，由国家力量介入、以政策工具引导制造业部分回流与升级的产业重构过程。再工业化可根据目标和手段划分为四种类型。① 市场自发型回流：企业基于成本变化，比如海外工资上涨、运输成本攀升，自主将部分生产环节迁回本土，政府仅提供一般性制度环境，部分劳动密集型组装环节回流便是典型。② 保护主义型复兴：政府通过关税壁垒、进口配额等贸易保护工具人为抬高海外生产成本，强制或诱导传统制造业回归，美国近年推行的关税政策就是典型案例。③ 创新生态型升级：政府通过研发税收抵免、知识产权

保护、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等方式营造创新环境，由市场力量主导先进制造业的投资方向与产业布局。

④ 战略引领型重构：政府以产业补贴、国有资本投资、供应链安全审查等手段，直接干预先进制造业的区位选择与产能建设。

基于哈维时空修复理论其核心逻辑是新一轮空间重组，旨在通过人为抬高海外成本、改善国内基建，应对供应链断裂、以及铁锈地带社会危机三重挑战。然而，这一“再修复”面临五大内在限度：一是高昂劳动力成本使国内利润率难以长期优于海外；二是既有海外巨额固定资本形成回流动能阻力；三是金融资本的结构性抵制，偏好投机而非长期产业投资；四是财政赤字与高利率下，大规模补贴易挤压私人投资；五是产业生态(供应链、技工、基建)的系统性缺失。这些障碍共同表明，再工业化无法根除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与利润率下降的根本矛盾，至多只能在地理与时间上暂时延宕危机[6]。

4.1. “再修复”的核心逻辑

基于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再工业化并非去工业化的简单逆转，而是旧有修复策略失效后启动的新一轮空间重组，即“再修复”。其核心逻辑体现为空间的回撤与再地域化。面对海外成本上升及供应链断裂威胁，此前“外包”的生产能力被部分“拉回”本土。关税等贸易壁垒人为抬高了“外部空间”的相对成本，使国内空间在资本区位计算中重获比较优势；同时，大规模基建投资旨在改善国内建筑环境，降低物流成本以吸引制造业落地。

4.2. “再修复”的内在限度

作为新一轮时空修复的再工业化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危机逻辑的固有限度，其面临的深层障碍印证了这一点。

第一，利润率规律的刚性约束。再工业化难以根本改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土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与严格监管。研究显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成本较亚洲国家高出 30%~50%；2025 年调研数据显示，美国以及欧盟国家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约为中国的 5 倍。企业回流后将再次直面迫使其外迁的结构性成本。除非政府提供永久性大规模补贴，否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长期利润率难持续高于海外，而这正是当年去工业化的原始驱动力。

第二，固定资本的锁定效应。过去半个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在海外构建了庞大生产网络并投入巨额固定资本。强制或诱导资本回流意味着既有海外投资面临贬值风险，这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均遭遇巨大阻力。哈维所揭示的“固定资本成为进一步空间修复的障碍”，在此具体表现为旧有空间修复的遗产阻碍着新一轮空间修复的展开。

第三，金融资本的结构性抵制。金融资本偏好短期投机与高频交易，而再工业化需要长期、耐心且固定在实体生产中的产业资本投入。只要金融业利润率持续高于制造业，产业资本便无法从根本上战胜金融资本。

第四，时间修复的财政陷阱。再工业化所需的大规模基建投资与产业补贴本质上是时间修复，通过长期公共支出来吸纳和引导资本。然而，高利率环境下政府偿债成本激增。为再工业化扩大财政支出可能反过来挤压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金融机构研究报告指出，若要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恢复至 1979 年水平，至少需 2.9 万亿美元投资¹，而在前述财政约束下，该数字的政治可行性备受质疑。

第五，产业生态存在系统性缺失。制造业回流不仅意味着工厂迁回，更需同步重建配套供应商体系、熟练劳动力队伍及物流基础设施。然而，历经数十年去工业化，产业生态已遭系统性侵蚀：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区域供应链支离破碎、基建老化构成“硬件瓶颈”。正如科尔尼咨询公司报告所示，2025 年发达

¹<https://m.yicai.com/news/102633899.html>

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回流指数虽小幅回升，但仍处负值区间²，这清晰表明，回流动力尚不足以抵消外移的结构性惯性。上述五大障碍共同指向一个根本结论：再工业化无法根除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与利润率下降的根本矛盾，它至多能在新地理边界内暂时缓解危机，却无法阻止下一次危机的孕育[7]。

5. GVC、VoC 与哈维时空修复理论的比较

在产业地理变迁的解释中，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并非唯一的分析框架。全球价值链理论(GVC)和多样化资本主义理论(VoC)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提供了有启发性的分析，但也各有其解释局限。全球价值链理论强调，当代国际分工已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以价值链片段化为特征的产品内分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实质上是其企业将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的结果，而非制造业能力的整体丧失。再工业化的可能性取决于一国能否在价值链中占据更高附加值的位置。GVC 视角的优点在于揭示了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和价值链治理结构的作用，但其局限在于：它倾向于将空间视为中性的“容器”，忽视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为什么某些空间能够吸引高附加值环节，而另一些空间则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哈维的理论恰恰揭示了这种空间等级的生产性根源：空间之间的不平等不是自然的比较优势差异，而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创造性破坏”的产物。多样化资本主义理论则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不同国家的制度禀赋——尤其是劳资关系、金融体系和企业治理结构——决定了其再工业化的路径和能力。VoC 视角的价值在于突出了制度差异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但其局限在于：它倾向于将制度视为相对稳定的、外生的变量，低估了资本积累逻辑对制度变迁的驱动作用。哈维的理论则表明，制度安排本身是资本空间修复过程的产物和条件，而非外在于资本积累的独立变量[8]。

6. 结论

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交替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及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提供了极佳的实证案例。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去工业化，实质上是资本为应对国内过度积累和利润率下滑而实施的大规模空间修复：通过将制造业外迁至海外，利用地理扩张来吸纳过剩资本并缓解利润压力[9]。这一策略虽在短期内见效，却未根除危机，仅是将其转移至新空间，同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土引发了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膨胀及社会撕裂等新矛盾。进入 21 世纪，再工业化成为总危机爆发后启动的新一轮时空“再修复”尝试，资本与国家力图借由“空间回撤”及“基础设施时间修复”来重构国内积累的物质基础。然而，受制于利润率规律的刚性约束、海外固定资本的锁定效应、金融资本的结构性抗拒、国家财政空间的压缩以及产业生态的系统性缺失等多重障碍，这种“再修复”依然难以摆脱“修复—再危机”的循环困境[10]。

哈维的核心洞见在于揭示了这一循环的不可终结性。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创造性地破坏”旧空间景观并构建新空间景观，以此一次次规避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危机”。但每次规避仅是延缓而非消除。只要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未被超越，过度积累危机便注定以新形态周期性重现。

据此理论视角观察，即便再工业化战略在政策层面取得某些局部成果(如特定行业就业回升或投资增加)，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制造业长期相对衰落的结构性趋势。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修复”，唯有永无止境的“修复—危机—再修复”周期循环。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不过是这一永恒循环在特定时空下的两次具体呈现，它们共同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局限：每一次空间的“fix”，均只是下一次危机的序曲。

参考文献

[1]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

²<https://companies.caixin.com/2026-05-06/102441173.html>

-
- [2]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 [3] Montero Bressán, J. (2022) Capitalist Crisis and the Geography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Human Geography*, **16**, 45-59. <https://doi.org/10.1177/19427786221120933>
 - [4] Gur, N. and Dilek, S. (2023) US-China Economic Rivalry and the Resho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6**, 61-83. <https://doi.org/10.1093/cjip/poac022>
 - [5] Stroud, D., Fairbrother, P., Evans, C., *et al.* (2023) Skill Development in the Transition to a ‘Green Economy’: A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Analysi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5**, 10-27.
 - [6] 孙舒悦. 大卫·哈维“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2.
 - [7] 王晓霞. 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机制”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悖反性研究[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1): 38-44.
 - [8] 林烨. 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理论探析[J]. 天府新论, 2021(2): 6-12.
 - [9] 高奇琦. 从独占幻想到全球共享: 奇点生产力加速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与中国希望[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4): 134-147.
 - [10] 姜晓燕, 赵鹤. 投资于技能: 再工业化背景下技能人才培养的战略定位和体系再造[J]. 中国高教研究, 2026(11): 93-100.